

■思想

中印竞赛 奥妙无穷



◎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这次去新加坡出席了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院主办的国际会议“全球中的南亚：走向更大的协作与合作”(South Asia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Towards Greater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会议就一天。在上午的开幕式上，新加坡外交部长George Yeo发表演讲。他选择的演讲角度非常好，是政治家应该有的视角，虽然常常不容易做到。他从历史文明的变迁路径和地理两方面对南亚的崛起给予了非常有意思分析。这让我想起这些年来一些好莱坞大片对历史文明的新解读方式。这些电影不求精致与细节动人，而追求主题、思想和恢弘的视野。陈凯歌的《无极》、张艺谋的《英雄》以及冯小刚的《夜宴》显然也有类似

的追求。George Yeo先生剑桥大学毕业，学工程的。他给我的印象跟香港特首曾荫权先生大致相同：精练、能干，激情和智慧，可以视作东南亚新一代技术官僚的典型代表。

两年前我访问甘地发展研

究院(孟买)时曾见过面的著名经济学家Nachane教授与我同在第一场发言。虽然事先并没有沟通，我们两人的发言却巧妙地达成了互补。他介绍了印度的经济改革和增长的特征性事实，最后提到了印度的增长面临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必须重新确定增长方向的政策。在印度的“十一五”计划中，政府把保护环境和培育更有利于社会整合的制度放在了优先的位置。我也从中国的改革与增长事实开始，最后谈到了中国的增长约束与增长转型。我也提到了中国的“十一五”规划。

有意思的是，印度是消费为基础的增长，而中国是投资驱动的增长。但印度在它的“十一五”规划中强调要转向更加环保的增长模式，不希望以发展那些被称为“不干净的产业”(dirty industries)来促进增长。而中国提出的增长方式的转型强调“科学发展”，也注重

对环境的友好和能源的节约。印度也想提高投资占GDP的比重，也想吸引更多外国资本，但印度要向外资开放的是服务业。中国的增长转型更注重提升消费的力量，希望降低投资率，增加政府和家庭的消费比重。尤其是，如果政府消费开支增长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开支增长的话，会诱导家庭的消费支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似乎要更多地走印度那样消费需求驱动的道路。而印度政府为了提高投资率，正在学习中国经济特区的经验。

但是，新德里政府推动经济特区的进展情况并不乐观。虽然受理了大约276个组建经济特区的申请方案，但联合政府的左派势力对此持反对的态度。据我了解，印度学者和政治家对要实行的特区政府多有分歧和争论。有人认为办特区会减少政府税收，有人认为特区会伤害劳动力的权利。中国在20多年前办特区的时候，小平同志遇到的非议和批评也相当集中，包括党内的不同意见。但是中国和印度的差别显然是，面对这些评论，邓小平可以说一句“不要争论了”就完事了。而在印度，争论将持续，并将最终影响政



中印两国有许多地方可以相互学习 资料图

策的宽度与深度。

中印两国有很多地方是可以相互学习的。去年双边贸易只有187亿美元，投资就更少了。中国只有50家公司在印度，而印度也只有150家公司在中国。印度学者告诉我，主要是1962年的边境事件对印度人影响太大了，印度的政客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总是忧心忡忡。从最近关于外资政策的立法讨论中就能感觉到，印度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将会有更多出于所谓“安全”的理由的限制。我告诉印度的经济学家，其实，尽管有些障碍，中国和印度还是在相互影响着对方。对印度来说，中国的开放政策、外商流入、宏观管理、政府治理、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基础设施的改善速度都让印度人有更多的反思和学习的机会。而印度在金融体制、公司治理以及如何对待本土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积累的经验正在中国受到关

注和研究，也是中国可以向印度学习的地方。

我的这个看法在午餐上引起了争论。我早就注意到，印度学者聚在一起总是对印度国内的经济与政治现状及其解释喋喋不休。坐在我身边的印度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口水仗一直持续到午餐的结束。印度真是民主国家吗？印度有良好的公司治理吗？印度有透明的制度吗？印度的要素成本比中国低，为什么同类产品却缺乏竞争力？为什么印度的产品比中国的同类产品贵？如服装。印度的收入不平等为什么这么严重？印度的GDP增长是真的吗？我很高兴我能听到他们对这些同样我也感兴趣的问题的争论和论点。

有人说，中国每年增长10%，印度增长7%，这3%的差距就是印度民主的代价。还有人说，印度生产成本不能降到中国的水平主要原因是腐败

盛行和体制化。另外，也有印度经济学家怀疑印度官方的统计数字。他举例说，根据调查，印度2002年有4000万孩子辍学了，可是在2004年的印度政府和世界银行的数据却显示，印度的识字率反而上升了。他说，根据这个识字率，应该推算出印度政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把辍学的孩子从4000万变成了500万，只有鬼才会相信这是可能的。

虽然这样的事情在印度、中国或其他国家都会发生，不过，数据的整体问题还没有严重到这样的程度，否则经济学家对印度和中国经济的现有认识就完全错了。我相信经济学家整体的解释应该没有大的出入，如果数据问题是递增的，那么中国经济早就该“爆炸”了。

类似的自由讨论实际上持续到晚餐结束。这也印证了我们过去经常说的那句话：会场外总是比会场内更精彩。

■创意上海

城市创新 功夫在文化



◎杨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专家

上周末的第18次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题是“提升城市创新能力”，这回，人文积淀、文化氛围对创新的作用成了讨论中频率最高的词汇。

上海现在的问题在于，“创新”已谈论多年，规划方案也制定不少，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存在很大缺憾。笔者认为，关键还是必须抓住五个要素：人本理念、文化氛围、微观活力、有效组织和制度保证。

为什么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那是因为，知识来自人的智慧，创新来自于人的行为，发展来自于人的努力。上海人很聪明，很努力，但政府主导型发展环境下形成的惰性、惯性和依赖性，以及由此造成的探索精神、进取精神、冒险精神的缺失，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上海城市创新的新原动力。因此，我们应该从提高上海市民素质入手，增强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并将之转化为创新的行为。当然，民众创新意识不会自发形成，因此需要通过在外竞争压力和内在目标追求来激活。一般而言，创新冲动与危机感成正比，与责任感也成正比。由此，危机意识、竞争观念、民族情感、历史责任的培育和强化，也就成了头等重要的事情。

“文化氛围”的塑造与人本理念有直接的关系，当人们的创

士随即提出的“独特文化+城市亲和力+创新氛围”建议，也进一步打开了大家的思路。

接下来需要强调的是“微观活力”。技术创新、工艺创新，以及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实际上都发生在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所以，我们应将注意力集中到激活微观层面的活力上，集中在激发科研人员和生产人员的创造力上。政府主导下的创新，最有可能出现“上热下不热”，如果创新意识和创新行为走不出政府大院，如果上海城市创新体系的重心仍然置于上端，那么就会头重脚轻，只有将重心下移，才能增加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创新体系。

当然，确立企业主体地位，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城市创新离不开企业创新，但是毕竟不同于企业创新，更需要全社会范围的“有效组织”。政府不仅需要提供制度平台、政策支持、传导机制和调节功能，而且需要整合科研资源、把握战略机遇、发挥带动作用、强占战略高地。

在投资推动型增长阶段，政府的政策导向一般聚焦于实体经济，注重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而在创

■金银岛

双罗交锋 谁能笑到最后

罗奇说：罗杰斯疯了吗？原油价格3个月内跌去了20%，而美国天然气价格的上涨更是让能源对冲基金Amaranth巨亏近60亿美元，黄金和白糖市场也持续走低。

罗杰斯说：这只不过是商品长期牛市中的一个短暂现象，是投资商品的一个良机。商品牛市将再持续10年，过去3年里，铜、锌和原油价格至少翻了一倍，预计还会看到更多商品的价格翻倍。

“双罗”对国际商品价格的这场交锋，实质是关于这场始于世纪初的商品牛市能否持续以及将持续多久的争论。“双罗”各自的观点的确也与他们已往一贯的思路合拍。罗奇是著名的悲观主义者，而罗杰斯唱多牛市已有8年之久，孰对孰错，谁将最终胜出，目前委实很难判断。影响未来10年商品市场走势的因素是如此的错综复杂，太多的不确定性决定着牛市的消亡或者持续。

■求索

幸运之神会再次眷顾阿里郎吗？

因顽强抗击金融危机而被国际经济界称为“优等生”的韩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却不太顺利，2001年、2002年经济增长率不到5%，大大低于自1962年实行现代经济增长以来的平均数7.2%。2003年更是流年不利，仅增长3.1%，是自1962年以来的第三个低增长率。2004年略有好转，增长率为4.6%；而2005年又下降为4%。至此，韩国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5年低于5%。

然而，青瓦台似乎仍然沉浸在以往的卓越奇迹中，他们的经济信心日益高涨，已开始着手“经济大国+福利天堂”的规划。近期，韩国政府公布了一项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提出在未来20年里，分两阶段把韩国建设成为各项经济、社会指标均居世界前列的一流发达国家，并主张不再让国民担心家庭、育儿和教育费、老年生活，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以韩国目前的经

济增长率，如何为国民提供如此优厚的福利水平呢？

从曾经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农业国家一跃而为如今的新型工业国，韩国已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另一个神话。从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直到1992年卢泰愚下台的31年间，由军事头脑总揽国家权力的威权政府直接推动了韩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些流行说法，是威权政府的强制性计划创造了韩国的“汉江奇迹”。但是，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们也不忘提醒大家，韩国的经济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绝佳的外部国际条件。在20世纪60年代的出口导向经济起飞的阶段，韩国正赶上国际上“三低”(低油价、低利率和低汇率)及国内低工资的有利时机，这为出口导向政策的成功提供了保障；在70年代的重化工业阶段，政府采取较为主观的产业升级政策，而忽略了经济

发展的自然性，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的结构严重失衡和宏观经济问题，如经济低速增长、高通货膨胀和出口竞争力急剧下降等。

韩国社会对政府增加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普遍提出怀疑。但恰逢此时，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发生危机，国际资本市场充斥着大量石油美元和欧洲美元，韩国通过国际贷款解决了重化工业投资资金短缺的问题，度过了重化工业发展的难关；进入80年代后期，由于世界经济的周期复苏，韩国重化工业积蓄的资本生产能力得到有效的释放，整个80年代经济平均增长率率达到9%，韩国经济因此进入新一轮持续增长；尽管90年代金融危机使大半个亚洲经济低迷，但中国崛起之后对地区金融稳定的成功救助使得韩国经济得以迅速恢复。

一路走来，幸运之神一直小心眷顾着这个倔强的民族。离开这些“偶然性”因素，韩国经济发展的结果可

◎倪金节
鲲鹏伟业投资管理公司分析师

恐怕是困难重重。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罗奇和罗杰斯对各自观点的坚守都有着很充分的理由在支撑。

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25年前美国两位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资源与极限问题的一段争论。当时乐观派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与悲观派经济学家保罗·埃尔里奇选定五种金属：铬、铜、镍、锡、钨，以1980年的价格为基准，赌10年后它们的价格是涨还是跌。当时两位各自的理由也都相当充分，外人也无法判断谁对谁错。到1990年，这5种金属无一例外地下跌，朱利安·西蒙赢了。

25年后，实战派的典型代表，罗奇和罗杰斯再次交锋，而且这次交锋的范围涉及整个商品市场，比25年前的争论更具挑战性，更值得期待。既然至少要等上10年才可能最终看到结果，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经济学博士

能与今天大相径庭。可是，从战火浴血洗礼中走出来的人们却更愿意把今日的经济崛起归结为民族的自尊和奋斗。毋庸置疑，民族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对于一个国家的崛起是至关重要的。但过于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日益高涨的信心就能继续往日的神话吗？在劳动力人口日益减少，经济活力日渐萎缩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名列世界第八位的目标呢？增加税收的“大政府”政策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率呢？世人在等待着聆听“汉江奇迹”的第二、第三乐章。

但愿赫尔墨斯幸运之神能再次向阿里郎伸出眷顾之手！

■乱弹

税改正当时



◎周洛华

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并购部副总经理
上海大学金融学副教授

我最近在清理书架，杂七杂八地翻阅了一堆旧书，从中却理出了一个意外收获：唐玄宗的开元盛世，税改是基础。唐玄宗废除了人头税，将原先按人口缴纳的粮食税改为了按拥有的土地数量来缴纳；按照人口收取绢麻布帛等纺织品；实现盐铁和漕运的国家专卖。这几项看似简单的税制改革，却是大唐盛世的经济基础。拥有土地越多的人须缴纳更多的粮食，这就避免了向中下层人民征税的社会矛盾，同时也鼓励了地主更多地应用新的耕作技术。自耕农的一个缺点就是无法应用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新的耕作技术没有推广的空间，这个矛盾随着税制的改革得到了解决。地主应用高效耕作技术和高产品种越来越多，其所缴纳的平均税率也就相应越低。

按照人口收取纺织品的办法在当时也很有效。唐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实现男女平等的最好阶段，生了女儿不要担心，因为女孩会织布，帮助全家人完成了纳税义务之后，可以享受基本的社会保障。朝廷根据户口上登记的人口，在荒年发放赈灾粮食。所以，在唐朝突然出现的人口暴增，并不是经济繁荣所致，而是以前那些为了逃避人头税而隐瞒的人口重新浮现出来了。朝廷收税的权利是以其承担的保障义务相联系的。不能一味地指望多收税，而是应该将税收和社会保障联系起来看问题。这个成绩的基础也是税收制度的改革。

对于商人的收税则体现为交易过程的税收，配合专卖制度和租金收入，朝廷从那些最具有地区差价的商品中收到了税，但没有过多地挤占漕运和自然资源，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因为经济繁荣而出现“煤电油运”的紧张局面。

唐初“施政以养民为先”，还建立了国家储备制度，在丰年买入粮食，在欠收的年份抛出，调节市场余缺。朝廷虽然举办了科举制度，但是选择人才的标准却不是“一刀切”，唐朝将官吏分为“士”和“吏”，前者通过科举考试而录取，掌管一些务虚的职务；后者通过下层官吏历年业绩的考核而提拔，主要承担实际操作。

翻看这些琐碎的历史资料，我发现唐代的税收制度实在是封建朝最合理的。如果不是玄宗打破了太宗皇帝亲自定下的“偏将军单骑入潼关”的规定，导致其政权建设松懈，也许开元盛世将持续更长一段时间。

税收不是让政府更加富裕的手段，而是给整个经济注入正确的激励机制。鼓励各方面从事各自具有优势的工作，同时创造市场环境，实现由贸易带来的繁荣和资源的使用效率。我国近几年的税收增加幅度很快，为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计，以减轻税收负担为主的税制改革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以实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税收应该成为落实中央各项经济政策的最好手段。两税合并讨论了很久，毫无疑问，合并之后将给政府创造更多的收入，与此同时，政府也应该承担相应的保障责任，积极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最近，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建立全民医保的目标，这表明，让中国纳税人享有更多社会保障的时候不远了。

其次，税制改革应该在经济调整之前，不能等到经济调整的时候再讨论税改。合理的税收制度将帮助我们熨平经济周期，延长繁荣的时间。

最后，税收制度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富裕的政府，而是要建立一个充满竞争活力的经济。税收制度要鼓励企业和个人提高效率，而不是简单的“劫富济贫”；税收制度本身也应该成为一个激励机制，这样才能更好地落实中央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政策。比如：如果我们将所得税改成了土地占用税，或者由物业税体现为地租的增加，就会迫使原来利润很低的企业退出市场，让出土地，由那些高效率的企业来运作同样的资源。如果继续征收所得税，而免除物业税，那些低效率的企业可以继续生存而根本不用考虑纳税，以至高效率的企业只能高价去购买资源，反而不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所占用的土地和其他资源来纳税，必然鼓励企业去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高附加值的产品的研发，也有利于给被征地农民的直接补偿。

再比如：如果我们废除中央财政的增值税，改征地方财政的消费税，对于食品药品等人民生活必需的商品免征消费税，就可以保障大多数居民的实际利益，也能抑制高消费人群的奢侈品消费。同时，也比较容易实现监管，不再会出现出口骗税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同时也鼓励了地方政府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而不是厂商(厂商往往是现在地方政府的纳税大户)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当然，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我们不能从“增加政府收入”或者“方便政府监管”的角度考虑税收问题，而是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设计税制。为此，我衷心拥护党中央最近一系列正确的主张，我希望政府从税制入手，尽快落实这些有利于全体人民的保障制度。